

对话

记者:《外国文艺》创刊已有30多年了,它最初的办刊宗旨是怎样的?现在这一宗旨是不是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和调整呢?

李玉瑶:“纯文学、高品位”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办刊宗旨。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国内能够坚持像我们这样做的杂志已经所剩无几,我们有责任坚守下去。借用著名翻译家、《外国文艺》编委林少华之语:“概而言之,那应该是出于一种对于文学、文化事业以至整个社会进步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而这在当下喧嚣浮躁、物欲横流、阅读出现危机的社会转型期,无疑是一种形而上的追求和高贵的坚守。”《外国文艺》曾经的辉煌大家有目共睹,而且《外国文艺》现在仍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一个品牌,我们不希望改变这本杂志的风格与定位,在新的外部条件下如何再让《外国文艺》走上一条复兴之路,是我们现在最大的任务。

记者:回顾33年《外国文艺》的历程,您能概括一下它所走过的不同阶段以及每个阶段的特点吗?

李玉瑶:回顾《外国文艺》的历史并概括其特点对我来说是个难题,《外国文艺》发轫于1978年,而我真正加入到其中是2009年。许多老编辑已经退休,甚至去世。简要说来,杂志创刊于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1978年。时代的需求赋予了它一份历史的担当。于是,它率先引进了现当代外国文学的优秀作家和作品,积极推介西方的文学流派和文艺思潮:人们或许因为它而了解了“黑色幽默”、“荒诞派”、“存在主义”、“后现代”。就传播信息、活跃文坛、推动文化界和翻译界的繁荣而言,20世纪的《外国文艺》是出彩的。由于“文革”的关系,在《外国文艺》创刊前,外国,尤其是西方文学与我们之间隔着一道墙,《外国文艺》则在墙上开了个窗口。今天这道墙上已经门户大开,窗口到了可有可无的程度;但那时,所有的人都拥挤到窗口前,只有在那里才可以看见外面的世界,一本杂志骤然间达到了

译介之旅

不知不觉间在日本文学翻译园地已潜心耕耘了近20载。也许是与翻译有缘吧,年轻时,翻译就一直是我的梦想,历经种种坎坷,终于走上翻译之路,一路走来,可谓甘苦自知。尽管付出了很多,但终于能够圆梦,亦是人生最大的收获。

文学翻译有别于一般的专业翻译,要求译者不仅具有较高水准的双语能力,还要对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都比较了解。此外,还需要具备对于所译文学作品及作者文学风格的解读能力、语言表现力、丰富的想象力以及自我认知度、身心投入度、生活阅历等等。可见,文学翻译不仅是一项语言活动,更是一项认知活动(语言、美学、文化),更重要的是异文化间的传递。因而,译者算得上是跨文化交流的使者。尽可能准确地传达异文化信息,乃是译者应尽的义务。

除上述基本素质外,翻译还需要不容忽视的技术层面,即翻译规律和技巧。在大量的翻译实践与积累中,掌握这些技法,是成为合格译者的重要一环。这就好比一个条件非常好的体育苗子,只有经过艰苦训练,真正掌握动作要领,才能出成绩一样。

日语和汉语属于不同语系,具有句子成分不固定、主语常常隐身、修饰语长、不规范表现较多等特点,翻译起来难度较大。和其他语言一样,除了熟练运用加、减、拆、换、反等基本功夫,日语翻译界同样长期存在着如下的本质争议:即在翻译过程中,是偏重于源语结构的表现或原作的传达(即直译、异化翻译),还是偏重于读者的期待或译入语文化的需要(即意译、归化翻译)的问题。

在国内外翻译界,自上个世纪中叶至今,对于译者主体性的研究逐渐受到了人们重视,译者逐渐由“隐身”走到了前台。但无论隐身与否,译者的角色都非常微妙,因为他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作者,还有广大的读者。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因译者的审美取向、价值理念的不同,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上面所述的倾向问题。以笔者之浅见,译者既然是跨文化中介人,恐怕过份偏颇一方无助于翻译质量的提升。说到底,世间万物皆相生相成,翻译亦不例外,不可绝对化,此中有彼,彼中有此,方为翻译之道。因此,越是能够最大限度的兼顾二者(即直译和意译)的品似,似应更符合时代的要求。

那么,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兼顾二者呢?笔者以为,衡量译本水准高低的重要尺度,不外乎四个字,即“达意”和“传神”。不知这四个字能否超越异化归化的争议。“达意”即“如实传达原意”,避免误译、漏译、死译等,属于表层的翻译要求。“传神”即“再现原作神韵”,追求语言符号的深层次对应。“达意”已不易,“传神”

# “我们当然仍要学习”

——访《外国文艺》执行副主编李玉瑶

□本报记者 王 杨

发行十多万册的盛况。上海译文出版社成立20周年时,出版了一本《作家谈译文》,里面有几十位当今中国文坛的风云人物写了他们与译文社出版的图书、刊物的关系,而其中有不少作家都认为,自己走上创作道路,是因为看了译文的书,也有的作家说,因为看了这些作品,他们产生了身为作家的幸福感。如果说上海译文出版社包括《外国文艺》改变了中国作家的版图,怕也不算过甚其辞吧。进入21世纪,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外国文艺》进入了一个低潮期。但让人欣慰的是外国文学译本却成为书店里不可缺少的大宗商品,而其中许多现在为人熟知的外国作家,他们的名字第一次登陆中国,就出现在《外国文艺》上面。要说《外国文艺》的功绩,就在此处,没有这个窗口,就没有今天的门户大开。

记者:去年杂志200期时请了一些老编辑或座谈或撰文。这些座谈的纪要和文章也刊登在2011年第五期的《外国文艺》上,可算做一种大事记。举办这些活动后,在编辑部和读者中引起怎样的反响,是否有一些新的办刊创意产生?

李玉瑶:2011年第五期,《外国文艺》迎来了创刊200期。为了做好这期内容,编辑部集思广益,策划了各种活动——开展了“我与《外国文艺》的那些事儿”读者征文活动,微博、豆瓣同步跟进;为庆祝200期而举行的新老编辑座谈会上,历任主编、编辑们促膝长谈,“却顾所来径”,交流杂志一路走来点点滴滴;以笔谈形式约请了杂志部分编者、译者、写者,其中包括著名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任溶溶先生,《外国文艺》老编辑戴际安先生,《外国文艺》编委、英美文学专家杨仁敬先生,《外国文艺》编委、拉美文学专家赵德明先生,数十年如一日为《外国文艺》撰写美术评论的欧阳英先生,《外国文艺》编委、著名翻译家林少华先生,《外国文艺》编委、翻译兼评论家谈峰先生,以及《外国文艺》编委、翻译兼评论家袁筱一女士,他们分别就各自心目中的外

国文学,《外国文艺》提出了独到的理解和希冀,读来温婉感人,文字间处处流淌着对过往的留恋和对未来的期许。另外由《外国文艺》编委、翻译文学研究家查明建先生执笔,以中外文学的视野对《外国文艺》三十几年的译介历程做了系统梳理,引领读者共赴《外国文艺》时光之旅。同时,编辑部还收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贺词,包括知名学者、翻译家、文学研究者,以及兄弟期刊等,相信200期之后的它,将继续打造精品译文,传承经典编艺,力求看得更高,走得更远。

记者:与其他同类的外国文学译文杂志,如《世界文学》《译林》《国外文学》《外国文学》等相比较,《外国文艺》的独特之处在哪里?

李玉瑶:《外国文艺》的特色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我们选择的作家基本上是在该国已经有名望的,少数是有潜力的新锐作家,以在世作家居多;二是基本上不重复介绍,至少不会在三五年里重复介绍;三是着重刊载作品,选择的作品是能够代表作家风格的,而评论等不占主要地位;四是注重作品的创新性和探索性。

与我们相比,《世界文学》更全面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作家,《译林》刊载的作品可读性更强,《国外文学》《外国文学》等更注重文学评论,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记者:我们知道,《外国文艺》会刊发外国文学作品,对于版权问题将如何解决?

李玉瑶:我们正在解决这个问题,这几年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一方面是直接跟国外的版权方联系取得他们的授权;另一方面是与国内版权购买者协商使用。同时我们也陆续跟各国驻华领馆及文化机构等建立起常态联系,由他们帮我们联系作家本人来获取授权。

记者:是否会与一些新资本进入媒

体行业后办的发表外国文学作品的杂志《天南》《信睿》《大方》(杂志与杂志书暂时都放在一起论之)进行合作,还是尽可能避开这些自找生机呢?

李玉瑶:上海译文出版社作为国内最大的综合性翻译出版社,本身就拥有丰富的版权资源,《外国文艺》作为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社办期刊,有整个出版社作为强大后盾,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很有底气的。我们汇集将努力全社版权资源之优势,策划出更精良的选题。我相信其他杂志也是跟我们一样都是为了把国外优秀的文学作品介绍给国内读者。当然对于优秀的作家作品我们肯定也会考虑进行合作,这是双赢的方式,何乐而不为?

记者:杂志在2010年以后在内容上有变化,在营销推广上也有很大变化,开了微博,上了豆瓣,与个体刊商进行了合作,这些新的形式给办刊者和刊物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

李玉瑶:虽然编辑部人手紧缺,但我们依然不忘杂志的营销。香雪也怕巷子深。当众多的选择让读者无所适从的时候,我们的引导必不可少,信息的传递也得迅速、及时。编辑早就不是一项单纯的埋头看稿的工作。编辑必须敏锐地捕捉文坛的变幻,了解读者的需求,适时调整选题推出的时机,制造话题热点。

记者:办刊多年,谈谈您做外国文学期刊的最真切的体会吧。

李玉瑶:办好一本外国文学期刊从来都是难上加难的。这是压力与机遇共存的一项工作。抢占先机,比别人更更快地发现国际文坛的新鲜热点是《外国文艺》出奇制胜的法宝。对编辑个人而言,除了基本的外语功底外,还要对文学的洞察力和驾驭语言的功力,有深厚的文化功底,同时不间断地收集、筛选来自各方面的无数信息。这些都要求编辑苦练内功,提升自身素质,才能具备更敏锐更独到的眼光,让期刊更上层楼。

# 漫谈日本文学翻译

□竺家荣



竺家荣,长期从事日本文学的研究与译介。主要代表译作有:《失乐园》《近似无限透明的蓝色》《丰饶之海——晓寺》《疯癫老人日记》《京洛四季——美之旅》《被偷换的孩子》《一个人的好天气》等。

则更难。“达意”是基础,“传神”是目标。

日本文学翻译史上的大家,如鲁迅、周作人、钱稻孙、丰子恺、刘振瀛、叶渭渠等先生都为此探索付出了巨大努力,为后世树立了楷模。看他们的翻译,很难说有什么倾向性,即便就二者孰优孰劣进行争论,也不外乎是为了更好地“达意”和“传神”而已。

具体到如何“达意”和“传神”,为了说明问题,姑且以拙译试举几例。

一、运用翻译技巧使译文达意、传神。拆译法·反译法:

風太はみかんの房についた白い筋を、面倒そうに一つ一つとっている。

译文:风太将橘子上面的白筋,一丝一丝地揪下来,也不嫌麻烦。

(直译是“显得很费事似的一丝一丝揪下来”,不如采用“拆译”和“反译”手法,一来加强语气,二来更符合汉语习惯。)

提炼法:

仙人みたいに見えなくもない苦劳の味がある容貌なのに、

译文:别看他长着一副仙风道骨般饱经风霜相貌。

(下划线处直译是“不乏仙人般历尽艰辛的相貌”,译成四字成语,不但言简意赅,而且加强了讥讽的效果。)

意译法:その再会は昼間の安いドラマそっくりだった。

译文:这重逢的场面简直和白天播放的那些粗制滥造的电视剧一模一样。

(安い原意是“便宜,廉价”,此处则根据内容需要,译为“粗制滥造”无疑更加贴切。)

文脉译:わたしは老人の暮らしを知らないが、どんなジェネレーションギャップにもまあ動けないでいよう、と決まっていた。が、意外とぶつうなのだった。

デザートには手作りらしいコーヒータをたらす動作へと、慣れたものだ。

译文:我不熟悉老年人的生活,不过我早就想好了,不管代沟有多大,我该怎么着还怎么着。没想到也差不了多少。甜点是自制的咖啡果冻。她把奶油挤成漩涡状的架势也蛮像那么回事。

(下划线处“该怎么着还怎么着”,若直译的话,是“我不会改变”;“蛮像那么回事”原文是“很熟练”的意思,为了凸显了80后女孩子的自我主张,以及对于舅姥爷的时尚感到意外,这样来选词,使得人物更加栩栩如生。

加译:その再会はずいぶん安いのドラマそっくりだった。

译文:这重逢的场面简直和白天播放的那些粗制滥造的电视剧一模一样。

(下划线处为加译,使句顺畅。)

二、多揣摩,多打磨,精益求精,追求达意、传神。

在达意的基础上,追求行云流水般的流畅自然,加一字则多的简洁明快、食不厌精般的细腻润色等,也有助于达到“传神”的境界。所以,参透作品,多多打磨,往往决定译文的神色。

比如,渡边淳一的作品尽管难度不高,但多描写男女之间的至情至爱,因此气氛的渲染至关重要。在选择词语时,需要特别用心地选用精致、浪漫、优雅的词汇营造激情澎湃的意境。为此,不厌其烦的修改润色必不可少。试举《天上红莲》开头的六稿修改来加以说明。

【初稿】一进入弥生时节,大地阳气回升,日光终于变得温暖起来,日照也仿佛顷刻间延长了似的。

虽已到酉时,四下里依然亮如白昼。

庭园山石旁摇曳着的榉棠花,犹如要挽留住那残阳一般,在夕阳的辉映下,越发黄灿灿的夺人眼目。

【二稿】进入弥生时节,大地阳气回升,阳光日渐和煦起来,日照也仿佛顷刻间延长了似的。

虽已是酉时,庭院里依然亮如白昼。中庭山石旁的榉棠花,映照在金光灿灿的夕阳下,摇曳生辉,耀眼夺目,宛如欲留住那残阳一般。

【三稿】进入弥生时节,大地阳气回升,阳光日渐和煦起来,日照也仿佛顷刻间延长了似的。

虽已是酉时,庭院里依然亮如白昼。前庭山石旁的榉棠花,映照在金光灿灿的夕阳下,摇曳生辉,耀眼夺目,犹如欲挽留那残阳一般。

【四稿】进入弥生时节,阳光日渐和煦起来,只觉得日照也仿佛顷刻间延长了。

虽已是酉时,庭院里依然亮如白昼。面前庭园山石旁的一簇簇榉棠花,犹如欲挽留那夕阳残照,愈加摇曳生辉,灿灿炫目。

【五稿】进入弥生时节,阳光日渐和煦起来,日照也仿佛顷刻间延长了。

辞旧迎新的心情里含有两种因素。一是回返度岁的太初之心,遥想自祖先绵延至今的营生,追溯民族的根源。二是更新心蓝,思考对未来的希望、实践与创造的蓝图。

我作为画家,对于万物复苏的新春的感慨必然是关于美,我想将当此静静的新年之际,站在对过去的乡愁和对未来的瞻望之歧路上,浮想联翩的思绪诉诸笔端。

日本人的审美感,自古以来,就是

由日本的风土特质培育出来的。我认为日本的自然之美,一言以蔽之,蕴含于四季应时的细微变化之中。在这个气候温和、湿润多雨的岛国,少有峻烈的大自然景观。然而,山林草木犹如神经敏锐的人一样,不仅随着季节更迭而变化,甚至每一天都会因天气、时间的不同,而产生微妙的差异,其表情可谓千变万化。在这样的自然中培育出来的日本人,无论多么细微的自然变化都会感受到,不止是山川野趣的寥廓风景,即便对一草一木亦寄予了关爱之情。变幻莫测的风雨云霞更增添了自然景观的情趣,造就生动的美景



记者:我注意到微博上《外国文艺》有一大批“粉丝”,这很令人感动。办刊过程中,你们和读者会有怎样的交流?而面临目前读者的年轻化,是否会在内容、作者等方面做出调整?

李玉瑶:开微博、建立豆瓣小组,用这些即时方式与读者们互动,这些都是我们为了适应读者年轻化所采取的一些举措。封面、选题、内容、翻译质量,都是我们与读者沟通的内容,表扬、批评、建议,我们同样欢迎。只要是关乎《外国文艺》的,都可以谈。同时,我们还经常收到读者投来的稿件,我们都会认真地尽力回复。

《外国文艺》从选题上一直关注的是最鲜活的当代外国作家作品,在这一点正好跟年轻人的需求相契合。如何挑选出最具特色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是我们最大的挑战。同时,对译者的挑选也是慎之又慎。得到公认的优秀译者固然是我们的主力军,但同时我们也致力于发现翻译界的新生力量,吸引更多新鲜的血液加入到翻译事业当中,也为译文出版社储备丰富的译者资源。

记者:《外国文艺》有电子杂志吗?是否考虑过网上办刊,如何解决版权问题?

李玉瑶:目前《外国文艺》还没有做电子杂志。但我们正在跟豆瓣网合作,推出网上阅读。目前在版权方面我们在取得纸质出版的同时也会签下电子出版的授权,而跟作、译者之间也达成协议,同时授权给我们电子版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记者:我们知道,一本杂志的成功,除了编辑人员的专业、敬业之外,还要有一批好的作者队伍。多年来,《外国文艺》在作者、译者队伍建设上做过什么样的努力?

李玉瑶:确实,外国文艺是一个非常宏大和笼统的文艺范畴,一本杂志的几个编辑肩负不起这样的重任。虽然我们也在密切关注文学动向,也发现新作品并

虽已是酉时,庭园里依然亮如白昼。盛开在假山石旁的一簇簇榉棠花,好似欲挽留那夕阳残照一般,愈加摇曳生辉,灿灿炫目。

【定稿】一进入弥生时节,阳光日渐和煦,日照也仿佛骤然延长了。

虽已是酉时(下午六时许),庭园里依然亮如白昼。正前方假山石旁盛开的一簇簇金黄色的榉棠花,好似欲挽留那夕阳残照一般,愈加摇曳生辉,灿灿炫目。

每一次修改,我都经过反复思考,筛选最合适而优雅的词语、最凝练的表现,避免重复。为此,对一个词的取舍,有时会犹豫很久,如“只觉得”、“起来”。甚至同样一个词会重复改好几次,如“庭院”和“庭园”。当然,整个译作那样打磨的话,即使几万字一本的小说,也要投入相当大的精力和时间。但精益求精,应该是译者努力的方向。

不过,翻译工作者自身的努力只是内部因素,影响翻译水准的因素还有许多,如读者的反馈及社会意识形态、译者定位、翻译标准、译者酬劳等外部因素。一部译作的诞生是这些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绝非单纯取决于翻译本身的优劣。

目前,出版界在市场作用下,引导着翻译的走向。翻译文学日益繁荣,与创作文学并驾齐驱。尽管不乏许多优秀译作,但翻译文学和译者的地位是否有所上升呢?笔者的回答是:在出版繁荣的表象背后,是缺少大师、精品的时代。

由于出版也受到市场某种程度的操控或经济利益驱动,导致选题盲目,鱼龙

译文

令人们叹为观止。不,日本人并非将大自然看作供人观赏的对象,而是生存于自然之中,让自己的呼吸与自然的呼吸合而为一,将自己的感慨系于自然。万叶以来的文学作品自不必说,就连原野上刮过的朔风、草叶上闪烁的甘露,皆可表现日本人心情的阴晴转换之妙。此外,日本美术史上的作品亦如此,一株花草,或霞光辉映下的几棵苍松翠柏,无不丰富地展示了自然生命的韵律。

我认为除自然观赏的细致入微外,日式式审美的另一特质在于优雅的装饰性。装饰性的美,不论东方西方,优秀作品数不胜数,但日本美的特殊性在于写实与装饰化的关联上。写实与装饰化原本是相反的因素,然而在日本美术中,它是浑然一体的。完成了这一典型的日本美的平安朝美术,既具有自然观照的细腻与优美典雅的装饰性的美,又不失存在对象的生命感特质。这一审美感觉尽管形式有所变化,却延续至今。例如宗达的艺术所表现的那样,其装饰化与单纯化,更加高扬和凝聚了存在对象所具有的生

组织翻译,但更重要的是依靠专家、学者和翻译家们,有了他们,观点、建议、选择标准和至关重要稿件都有了。正因为此,我们于2009年成立了《外国文艺》编委会。编委会从年龄上由老中青三代构成,有从上世纪70年代就为杂志撰稿的退而不休的老翻译家,也有高校里各个语种的学科带头人;从语种上涵盖了英、法、日、德、西、俄等各个重要语种;从地域上,编委们主要来自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重点院校。我们的意图是以这些专家学者们为依托,建立起一个辐射全国的作、译者网络。

记者:200期之后的《外国文艺》是否可以说是“重新开始”,您作为执行副主编,对今后有何期望呢?

李玉瑶:杂志之所以能不间断地出刊至今,当归功于读者不离不弃的关注和需求;归功于作、译者长期的支持和奉献,也关乎前瞻性,也有不懈和努力。无论杂志在其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经历过怎样的动荡和嬗变,遭遇过怎样的困境和挑战,这份忠实,这份付出,这份执着,始终由这个群体薪火相传。我既为之而欣喜,更为之而感激。而我们将用实际行动来回馈这一切。我们会严抓筛选,用更具前瞻性、更独到的眼光去挑选作家作品,策划更精彩、更具话题性的主题,让杂志的品质再上层楼。我们会邀请更多优秀的翻译人才进入到我们的译者队伍当中来,将原汁原味的优秀翻译呈现给读者,应该看到,随着信息渠道的多元化、阅读习惯的改变,尤其是网络时代的到来,《外国文艺》也面临与其他纯文学刊物相同的市场困境。如何找到真正能解决文学阅读的方式,如何面对追求形式创新、明星效益等生存之道,确实是极富挑战的课题。在这里,不妨借用一句鲁迅先生的话:“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学习二字权当求索。求索需要理性的思考,亦需要对信念的执著。

混杂。部分译者因各种外部原因,或流失,或被出版社牵着鼻子走。

例如,有些公版书(不需要购买版权的作品)存在参差不齐、盲目扎堆、急功近利等现象,重译过多。以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为例,除丰子恺初译本外,复译本达八九个之多。粗看了一下,好几本都与丰子恺的初译本几乎完全一样。当年,丰子恺的初译本有钱稻孙、周作人等翻译家校对,花费4年时间译成。因此,绝非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翻译这样的名著,超越前译更非轻而易举之事。更有甚者,就是中国戏剧出版社的宋瑞芬现象,竟然一人翻译数十本各种语言的小说,且几乎都是盗版,却堂而皇之在网上销售,何其怪哉!

多年来,译界同仁就文学译者的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问题、盗版问题、评估体系问题、监管机制问题、翻译批评的建设等进行了“前仆后继”的努力,却收效甚微。优秀译者的流失导致精品越来越少。长此以往,势必给译坛带来致命的打击。

作为一介译者,我只想借此机会呼吁,译者首先应打破自身对于翻译工作的轻视和无视。“即使是仆人,一方面仍不妨保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人性和创造性。”只有保持一份自尊,不随波逐流,才能得到社会的尊重。但只凭译者们单打独斗,无异于像村上春树所说的“鸡蛋与高墙”的关系那样。创造良性循环的文学翻译机制,不仅寄希望于译界同仁的齐心协力,更需要全社会达成共识。

大和绘与琳派成为明治以后日本画的巨大支柱,便是不言而喻的了。虽说大和绘式的美构成日本美的典型之一,但是如果没有宋元的水墨画、明清的南画、明治以后西洋画的传入等等,日本画的血脉恐怕会枯竭的。与异质的东西相融合,受到外来物的刺激,实在是值得庆幸之事。

从前,产生大和绘的自然环境是以奈良和京都为中心的,现在,日本的山水水都可以成为画题的对象,所谓日本式的这一观念内涵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非但如此,交通工具的发达,使人们远赴海外,扩大取材的范围成为可行之事。处于这样的时代中的日本画,增添了过去所没有的内容、形式和表现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也有许许多多的梦想寄托于国外之旅。

但是,我不是失去心灵的故乡。它就存在于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我愿继续致力于发扬日本画具有的优良材质。以上便是我于此新年之际的感想之一端。

——竺家荣译东山魁夷《思考于歧路》